

谁在支持特朗普：实证分析美国民粹主义^{*}

付 舒

【内容提要】 自 2016 年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唐纳德·特朗普经历了弹劾、败选和多次法律诉讼,依然稳定保有共和党选民的基本盘,目前已赢得 2024 年美国总统大选,将再次入主白宫成为第 47 任美国总统。学界普遍把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视为特朗普崛起不可或缺的原因,但特朗普崛起和回归的背后反映的民粹主义内核究竟是什么?本文基于民粹主义的理论文献,采用科学量化的分析方法,使用美国全国选举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在 2012、2016 和 2020 年的民调数据,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测量了滋生民粹主义的政治、经济、身份三个维度的诱因,勾勒出支持特朗普的右翼铁票的选民画像,并使用多种统计模型分析这些民粹诱因对美国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美国选民在政治、经济和身份维度的危机感,能够解释他们对民粹候选人特朗普的支持程度,并且身份上的排外主义、白人至上以及对外来移民的抵制是特朗普崛起的最大诱因。身份维度的焦虑最能解释美国右翼共和党保守派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并且这种身份焦虑在 2012 年已然存在,且经历特朗普四年的执政,这种以身份焦虑为核心的民粹倾向愈加影响美国选民的投票选择。如果无法解决政治低效、经济放缓和身份认同焦虑问题,美国的民粹主义危机会愈演愈烈,美国的民主会进一步倒退。

【关键词】 特朗普 民粹主义 身份焦虑 投票行为

【作者简介】 付舒,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系系助理教授。
电子邮箱:fushu@sjtu.edu.cn

^{*} 本文受上海交通大学文科青年人才培养计划项目“民粹时代下的美国总统选举研究”(项目编号:2024QN007)资助。感谢《国际政治科学》期刊编辑和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感谢刁大明、刘豫群、吴心伯、吴文成、田野、林红、许嫣然、张扬等学者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建议与帮助。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国际政治科学》2024 年第 9 卷第 4 期(总第 36 期),第 73—107 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一、引言

近十年的美国,政府效率低下甚至一度停摆,经济放缓且制造业就业低迷,身份认同受到移民及其带来的多样性冲击,欠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为民粹主义提供了丰沃的土壤。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正是利用了美国民粹主义的暗流涌动,以共和党作为平台,宣扬“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意外地当选了美国第45任总统。^①2020年,特朗普未获得连任,但其支持者多次尝试推翻选举结果,甚至暴力冲进国会山引发骚乱。直到2024年的今天,他历经两次被国会弹劾和四次共91项法律起诉,却依然稳定保有共和党选民的基本盘。多个民调机构的数据显示,平均而言每10位共和党选民中就有7位支持特朗普。^②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特朗普势如破竹地赢下共和党党内初选,并在大选中以同时赢得选举人团和普选票的方式,当选第47任美国总统。因此,特朗普现象背后的深层动因仍备受学界关注。

大量研究将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视为特朗普胜选不可或缺的原

① 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战胜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的意外性,指的是选举前的绝大多数民调公司都预测希拉里会胜选,但最终希拉里在赢得大众选票的情况下,在选举人团票数上输给了特朗普。参见 FiveThirtyEight, “Who Will Win the Presidency,” 2016 Election Forecast, <https://projects.fivethirtyeight.com/2016-election-forecast/>, 访问时间:2024年7月17日。关于2016年总统选举的详细回顾和反思,参见 John Sides, Michael Tesler, and Lynn Vavreck, *Identity Crisis: The 2016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the Battle for the Meaning of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② Pew Research Center, “Little Change in Americans’ Views of Trump over the Past Year,” Jul 21, 2023,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3/07/21/little-change-in-americans-views-of-trump-over-the-past-year/>, 访问时间:2024年7月17日; Associated Press, “Trump Enjoys Strong Support among Republicans. The General Election Could be a Different Story,” Aug 16, 2023, <https://apnews.com/article/trump-election-2024-indictments-ddfd50492dc576c0c2ca2d1afe0e4639>, 访问时间:2024年7月17日。

因。^①2024年特朗普的强势回归意味着挖掘美国民粹主义背后的核心诱因依然是理解当今美国政治发展的关键钥匙。现有的相关文献以理论探讨为主,从政治、经济、文化多个维度来解读美国民粹主义的兴起,但是,仍有诸多理论问题亟待更进一步的分析。到底是哪种民粹诱因主导了特朗普现象?不同维度的民粹诱因的解释程度有多大?美国民粹主义的历史变化如何?

本文基于现有文献的理论探讨与概念界定,创新性地运用量化分析的方法揭示特朗普崛起背后的选民特质,评估不同维度民粹诱因的解释力大小,从而厘清美国民粹主义兴起的关键要素。本文核心的实证发现聚焦于美国民粹主义的三大诱因,即政治危机感、经济危机感和身份危机感。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证明了美国选民的身份危机感最能解释对特朗普的支持。

① 陶文钊:《“特朗普现象”剖析》,载《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6期,第3—15页;肖河:《美国反建制主义和特朗普政策》,载《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2期,第62—94页;付随鑫:《美国的逆全球化、民粹主义运动及民族主义的复兴》,载《国际关系研究》,2017年第5期,第34—46页;张景全:《民粹主义思潮下的特朗普政府内政与外交》,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22期,第48—56页;莫盛凯:《“特朗普冲击”与2016年美国大选:基于民调的回溯性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3期,第106—141页;金君达:《特朗普时代美国共和党“建制派”的行为模式分析》,载《美国研究》,2018年第5期,第126—140页;刁大明:《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逻辑、成因与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6期,第19—27页;丛日云:《民粹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论西方知识界解释特朗普现象的误区》,载《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期,第118—137页;王浩:《美国政治的“特朗普革命”:内涵、动因与影响》,载《当代美国评论》,2021年第2期,第81—98页;庞金友:《极化格局下的路线之争:后特朗普时代美国政治思潮的可能图景》,载《比较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2期,第67—85页;谢韬:《美国两党选民的阶层重组》,载《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12期,第44—53页;徐果:《浅析特朗普主义的兴起和影响》,载《西部学刊》,2023年第12期,第30—33页;William Galston, *Anti-pluralism: The Populist Threat to Liberal Democrac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ippa Norris and Ronald Inglehart, *Cultural Clash: Trump, Brexit, 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Diana Mutz, “Status, Not Economic Hardship, Explains the 2016 Presidential Vot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115, No. 19, 2018, pp. E4300-E4339; William Howell and Terry Moe, *Presidents, Popu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0.

相较于政治和经济维度的危机感,美国选民的身份认同危机主导了当今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同时,本文还分析了美国选民的民粹程度与投票行为相关性的变化趋势,并发现以身份焦虑为核心的民粹倾向愈加影响美国选民的投票选择。这一系列实证发现有助于把握当今美国国内政治机理,并为我国的对美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因此,本研究对于把握中美关系发展态势,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具体而言,本文使用美国全国选举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在2012、2016和2020年的民调数据,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测量美国民众在政治、经济、身份三个维度的危机感或焦虑感,勾勒出支持特朗普的右翼铁票的选民画像。为了厘清特朗普在2016年的崛起(甚至2024年的卷土重来)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这些民粹主义的诱因多大程度上影响美国选民的投票行为。实证结果发现,在2016年,美国选民在政治、经济和身份维度的危机感都与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程度呈显著的正相关,而且身份维度的排外主义、白人至上以及对外来移民的抵制是特朗普崛起的最大诱因。不仅如此,身份维度的焦虑在2012年已然存在,且经历特朗普四年的执政,这种民粹危机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无论特朗普在2024年是否能够再次当选总统,以身份危机感为核心的民粹主义,已然根植美国政治生态,且将会长期影响美国政治及国际关系。

本文在国内外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对特朗普与美国民粹主义这一主题研究有如下的几点贡献。首先,本文在特朗普与民粹主义这一老话题的基础上,创新性地以量化方法对民粹主义三大诱因进行了测量,并估计出不同维度民粹指标的影响程度大小。现有的相关文献以理论探讨为主,本文运用因子分析对选民内心潜在的民粹主义诱因进行了科学的量化测量,具有方法上的创新性。其次,就美国民粹主义而言,现有的理论讨论尚无法论证特朗普的崛起迎合的是哪类民粹。本文利用高质量的数据和统计方法对民粹主义产生条件进行实证测量,然后分析究竟哪些条件更能解释特朗普的崛起,其实证结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特朗普现象,并且对特朗普现象背后民粹选民的投票行为有更深的把握,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最后,现有文

献对于特朗普导致民粹还是民粹导致特朗普,尚无系统的论证。客观来讲,正是特朗普的出现让学界认识到美国民粹主义的危机,同时特朗普的四年总统任期也促使美国民粹主义危机的愈演愈烈。回答这样一个因果推断问题,固然是困难的。本文在对民粹主义产生条件的测量基础上,尝试利用2012年至2020年的数据对这一因果问题进行回答。因此,本文从美国国内政治出发,挖掘特朗普现象背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诱因,从而有助于把握美国政治发展逻辑,为看清中美关系发展的态势提供科学依据。

二、文献回顾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美国学者将其视为美国历史的一道分水岭,因为“从此美国总统职位被一位民粹政客所蛊惑”^①。为什么将特朗普称为“民粹总统”?他的崛起与美国民粹主义危机存在怎样的联系?我们有必要首先从理论上厘清民粹主义的概念、诱因以及测量。本节对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和美国政治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就民粹主义的概念及其产生条件进行简要的梳理与评述,并简述现有文献对民粹主义的测量策略。

(一) 民粹主义的定义

民粹主义(populism)似乎已经成为当今欧美政治的一股潮流,^②在当代

① William Howell and Terry Moe, *Presidents, Popu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p. 1.

② 民粹主义,在美国体现在2010年茶党的兴起、特朗普的当选,甚至左翼的桑德斯和沃伦也带有一定的民粹标签;在欧洲体现在英国鲍里斯·约翰逊的当选首相以及退出欧盟的全民公投、法国右翼国民阵线等;在拉美,民粹主义领导人就几乎不间断地涌现,阿根廷的胡安·庇隆(Juan Perón)、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以及巴西的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等。民粹主义,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仍然占据新闻头条。例如,2023年11月,阿根廷右翼民粹主义政客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当选新任总统,荷兰极右翼民粹政客海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在荷兰议会选举中获胜。

政治理论的探讨中也逐渐显现并日趋重要。^①民粹主义是一个非常难以界定的概念。在日常用语中,民粹经常与社会底层人民相互关联。正如牛津英文字典的定义所说,民粹主义代表平民的想法和诉求。^②民粹主义者往往是“小人物”,其诉求通常是对富人征税,重新分配资源以救济穷人,争取社会公平等。虽然学者们对民粹主义尚未达成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对民粹主义的核心特质达成了一定共识。

民粹主义的核心标志是平民主义对精英主义的反制。^③民粹主义脱胎于民主政治,但与其有本质的不同:自由式民主容纳或依赖精英,民粹主义却反对精英。具体而言,刘瑜认为民粹主义对精英主义的反制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智识三个层面。^④政治上,民粹主义运用组织、资源和话语权来追求底层平民的政治影响力,并且往往依赖“孤胆英雄式”的政治强人。经济上,民粹主义反对经济不平等。尤其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底层平民无法获益,因而反对上层精英对贸易利益的攫取。智识上(或身份上),民粹主义仅以多数的人数或特殊的身份来获取合法性。尽管民粹主义也分左翼民粹和右翼民粹——左翼民粹强烈呼吁保护穷人的利益、抵制腐败、反对富人,而右翼民粹拥护爱国楷模、尊崇传统、反对移民和精英——他们都视现有精英政治体制为反制对象。

民粹主义的概念本身往往带有贬义色彩,因为民粹主义的目标是动员

① 关于民粹主义的理论探讨与回顾,参见 Nadia Urbinati, “Political Theory of Populism,”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2, 2019, pp. 111-127; John Judis, *The Populist Explosion: How the Great Recession Transformed American and European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Global Reports, 2016; Jan-Werner Muller, *What is Popul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6; Pippa Norris and Ronald Inglehart, *Cultural Clash: Trump, Brexit, 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② Oxford Learner's Dictionaries, https://www.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us/definition/american_english/populism, 访问时间:2024年7月17日。

③ 刘瑜:《民粹与民主:论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第68—75页;林红:《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④ 同上,第69页。

选民,进而对现有制度进行攻击和破坏。^① 民粹主义没有积极清晰的议程,没有完整一致的政策。民粹政客的唯一目的是赢得选举并获取权力,他们用煽动性的口号来动员民众支持,丑化“非我族类”的群体,用蛊惑人心的策略来挑起恐慌、不安与愤慨。民粹主义者追求政治公平与合法性的唯一途径是掌握政权。而民粹者一旦掌权,便会迫害其内外敌人,比如建制派、全球化资本家、外来移民等。^② 民粹主义者的最大敌人是现有制度,他们竭尽一切所能削弱精英和建制。正如政治哲学家纳迪亚·乌尔比纳蒂(Nadia Urbinati)在发表于《政治科学年度评论》的《民粹主义的政治理论》中所总结的:“在民粹主义中,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变成了一些人反对另一些人的多数人暴政,并且被政治强人所具象化,被选票所合法化,带有对现有制度的抵制与破坏。”^③

(二) 民粹主义的诱因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学者对民粹主义的诱因进行了诸多探讨。威廉·豪威尔(William Howell)与泰瑞·莫(Terry Moe)在《总统、民粹与民主的危机》一书中,从全球视角对民粹主义进行了历史的回顾,并挖掘出世界各国民粹主义的共性以及产生民粹主义的条件。^④ 他们认为,当今美国政治中民粹主义的诱发因素与其他民主国家以及不同历史阶段的诱因具有相似性。从理论上归纳出产生民粹的条件,是理解特朗普的崛起和美国政治未来走向的一把钥匙。在已有文献基础上,笔者归纳出滋生民粹主义的三大条件:政治危机感、经济危机感和身份危机感。政治危机感是民粹主义内涵

① William Howell and Terry Moe, *Presidents, Popu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p. 9.

② Theda Skocpol and Vanessa Williamson, *The Tea Party and the Remaking of Republican Conservatism*,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③ Nadia Urbinati, “Political Theory of Populism,”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2, 2019, pp. 111-127.

④ William Howell and Terry Moe, *Presidents, Popu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的外在表现^①,经济危机感在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对应国际贸易与全球化的影响^②,身份危机感也被政治学学者讨论甚多,强调民粹主义的文化诱因^③,因此从政治、经济、身份三个维度可以较全面地剖析民粹主义内涵,确保了概念的有效性。

第一,民众的政治危机感容易诱发民粹主义。在猖獗的腐败与虚弱的政治体制下,民众对失效的政府产生不信任。当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以及对建制精英的反叛达到一定程度时,最易受民粹政客的蛊惑。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初的拉丁美洲国内政治是佐证政治危机感诱发民粹主义的典型案例。比如,阿根廷总统胡安·庇隆(Juan Perón)在任时(1946—1955年和1973—1974年),他反对腐败的建制派精英,迎合劳动阶级、扩大政治支持并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是一位典型的民粹主义政治强人。^④再比如,委内瑞拉的查韦斯(Chávez)、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Morales)以及巴西的科雷亚(Correa)和博索纳罗(Bolsonaro)同样利用民众对现有政治制度的不满,呼吁反精英、反腐败、反建制,以民粹的方式上台掌权。^⑤因此,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与民粹主义政治强人的崛起有很强的相关性。

第二,民众的经济危机感容易诱发民粹主义。经济全球化与技术革新

① 参见刘瑜:《民粹与民主:论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第68—75页。

② 参见 David Autor David, David Dorn, Gordon Hanson and Kaveh Majlesi, “Importing Political Polarization?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Rising Trade Expos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10, No. 10, 2020, pp. 3139-3183.

③ 参见 Pippa Norris and Ronald Inglehart, *Cultural Clash: Trump, Brexit, 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④ Frederick Turner and José Enrique Miguens, eds., *Juan Perón and the Reshaping of Argentina*,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3.

⑤ Sebastian Edwards, *Left Behind: Latin America and the False Promise of Popu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Kirk Hawkins, *Venezuela's Chavismo and Popu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造成的国内经济下滑,往往会导致国内劳动成本的上升和税收的提高。^① 经济外包和开放市场更恶化了这一后果,导致本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受到经济全球化重创的本国民众,例如制造业的蓝领工人,往往面临工资下降甚至失业的境况,所以会更加青睐于民粹主义者的号召,反对现有政治制度下的经济不平等。典型的例子发生在二十世纪末的美国。伴随着全球化,美国的制造业不断被日本和西欧抢占,并且在1991年陷入一场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工资水平停滞不前。随之而来的是中产阶级和中低收入阶级不满情绪的积累,以金融和服务行业为主导的后工业时代,使他们成了被遗忘的那群人。^② 民众经济危机感的上升导致了罗斯·佩罗(Ross Perot)和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这两位民粹总统候选人的出现。堪称在近代美国政治中最具影响力的第三党候选人佩罗代表了左翼及中间偏左的民粹主义,而参与共和党初选的布坎南则代表右翼民粹。^③ 他们的崛起正是源于全球化造成的美国本土制造业的流失,以及中低阶级对政治精英采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不满。

第三,民众的身份危机感容易诱发民粹主义。全球化导致移民的大量涌入,造成本国民众的身份认同危机。这部分民众更容易受到民粹主义者的煽动,将移民视为威胁本国生活方式的“他者”,认为移民都是非法甚至罪恶的。近年来的西欧社会是身份危机诱发民粹主义的典型案例。回溯历史,西欧国家一向在抵御民粹主义上表现优异,因为西欧国家普遍经济发展

① Paul Pierson ed.,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Alexander Hicks and Christopher Zor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Macro Economy, and Reversals of Welfare: Expansion in Affluent Democracies, 1978—94,”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3, 2005, pp. 631-62; James Bisbee, Layna Mosley, Thomas B. Pepinsky and B. Peter Rosendorff, “Decompensating Domesticall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nti-Globalism,”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27, No. 7, 2020, pp. 1090-1102.

② 约翰·朱迪斯著、马霖译:《民粹主义大爆炸:经济大衰退如何改变美国和欧洲政治》,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41页。

③ 对于佩罗和布坎南作为民粹候选人的详细描述,参见朱迪斯:《民粹主义大爆炸》。

水平优异,居民收入和教育水平较高。^①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创新,西欧国家出现大量的外来移民。在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外来移民普遍被视为一件好事,因为他们有助于本国经济发展且并不威胁本地民众的身份认同。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下滑和工作岗位的紧俏,这些移民对就业岗位的持续挤占,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平衡。西欧国家从来都不是“大熔炉”,多样性对其身份独特性和民族同质性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即使西欧在社会问题上(堕胎、同性恋、宗教等)持包容态度,外来移民对国家民众主体身份的威胁仍然激活了其潜在的传统和保守。这种身份的危机感又被经济下滑和政治失效放大。总之,西欧民众的身份危机感,以及他们对自我身份认同的保守态度,成为英国退出欧盟公投、法国国民阵线和北欧国家右翼政党的崛起等一系列事件的诱发条件之一。

(三) 对民粹主义的测量

民粹主义是一个多层面现象,社会科学领域的不少学者对民粹主义进行了测量。^②基于民粹主义的不同主体,现有文献对民粹主义的测量大致可分成两种策略。一种策略是通过对政策进行语意分析,就政党和领导人的民粹主义水平进行测量,即“供给方”的民粹程度。^③另一种策略则侧重于评

① Adam Przeworski, Michael E. Alvarez, Jose Antonio Cheibub and Fernando Limongi,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Charles Boix and Susan C. Stokes, “Endogenous Democratization,” *World Politics*, Vol. 55, No. 4, 2003, pp. 517-549; 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② 关于对民粹主义的测量的回顾,参见 Olivas Osuna José Javier and Rama José, “Recalibrating Populism Measurement Tools: Methodological Inconsistencies and Challenge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Side of Populism,” *Frontiers in Sociology*, Vol. 7, 2022, pp. 1-21.

③ Matthijs Rooduijn and Teun Pauwels, “Measuring Populism: Comparing Two Methods of Content Analysi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34, 2011, pp. 1272-1283; Pippa Norris, “Measuring Populism Worldwide,” HKS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RWP20-002, February 2020.

估其“需求方”的民粹程度,即公民或选民表现或感受到的民粹主义态度和信念。^① 其中最有影响力并被广泛使用的测量民粹主义的方法来自艾克曼(Agnes Akkerman)及其合作者,他们启发了一系列学者采取相似方法来测量民粹主义。具体而言,此类方法根据跨国民调,使用项目反应理论(Item Response Theory, IRT)对民粹主义进行测量。^②

对民粹主义测量的相关文献多针对全球或欧洲国家,而特朗普的崛起和持续影响引发学界对美国民粹主义的广泛关注。但是,现有文献对美国民粹主义程度的测量以及量化分析美国民粹主义诱因的研究仍相对欠缺。美国民调数据虽然丰富,但鲜有民调专门对民粹主义进行问卷设计。一方面,因为民粹主义是一个多层次现象,相对难以测量;另一方面,因为美国学界对民粹主义的关注是相对近期的事,相关的系统实证研究不多。本文实证部分将会根据已有的民调数据和统计方法,使用因子分析法,从不同维度的民粹主义诱因来测量美国选民的民粹程度,并检验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对现有文献作出创新性贡献和补充。

三、特朗普与美国右翼民粹主义

2015年6月16日,唐纳德·特朗普乘着纽约特朗普大厦的金色电梯缓缓驶下,正式宣布竞选美国总统。在四十五分钟的演讲中,他抨击政客和官僚的丑陋,批评国际贸易对本土就业的影响,反对外国移民的大量涌入,指

① Agnes Akkerman, Cas Mudde and Andrej Zaslove, “How Populist are the People? Measuring Populist Attitudes in Voter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7, 2014, pp. 1324-1353; Anne Schulz, Philipp Müller, Christian Schemer, Dominique Stefanie Wirz, Martin Wettstein and Werner Wirth, “Measuring Populist Attitudes on Three Dimens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Vol. 30, 2018, pp. 316-326.

② Steven Van Hauwaert, Christian H Schimpf and Flavio Azevedo, “The Measurement of Populist Attitudes: Testing Cross-national Scales Using Item Response Theory,” *Politics*, Vol. 40, No. 1, 2020, pp. 3-21; Bruno Castanho Silva, Sebastian Jungkunz, Marc Helbling and Levente Littvay, “An Empirical Comparison of Seven Populist Attitudes Scale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72, No. 2, 2020, pp. 409-424.

责外交政策的软弱。其演讲内容带有浓重的民粹色彩,他说:“我是你们的声音,我一个人能解决问题。”^①特朗普向选民传递了一个信号,即他就是那些被遗忘的大众所期待的政治强人。

特朗普的崛起源于美国民众对民粹的渴望,这种渴望恰好反映出美国民众在政治、经济与身份三个维度上的危机感。第一,在政治维度上,美国选民的危机感体现在对“建制派”(establishment)政客的不信任和厌恶。^②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结果显示,经历了小布什和奥巴马两任总统后,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逐年大幅度降低,从2001年的约50%降到2016年的20%以下。^③可以说,美国民众较高的政治危机感为特朗普的崛起创造了客观条件。特朗普作为一个政治“圈外人”(outsider),打着“抽干华盛顿的泥沼”(drain the swamp)的旗号,呼吁将权力还给人民,甚至利用推特直接与选民连线,与传统建制派政客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在经济维度上,美国选民的危机感体现在民众对于经济全球化影响下本地经济、金融以及就业状况的担忧。^④特朗普在经济上呼吁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和“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等口号。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特朗普横扫了铁锈带(rust belt)摇摆州。铁锈带指的是美国五大湖附近传统工业衰退的地区,包括宾夕法尼亚、密西根、俄亥俄和威斯康星,这些州受经济全球化的重创,工业和制造业衰退明显。^⑤上台之后,特朗普于2019年对中国发动“贸易

① Alexander Burns, “Pushing Someone, Rich, Offers Himself,” *New York Times*, June 16, 2015.

② Catherine Fieschi and Paul Heywood, “Trust, Cynicism and Populist Anti-polit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Vol. 9, No. 3, 2004, pp. 289-309.

③ 在民调数据中,对政府的信任程度由“相信政府一直或经常会做出正确的事情”的百分比来测量。参见 Pew Research Center, “Public Trust in Government: 1985—2023,”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23/09/19/public-trust-in-government-1958-2023/>, 访问时间:2024年7月17日。

④ Walter Bossert and Conchita D'Ambrosio, “Measuring Economic Insecurit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 54, No. 3, 2013, pp. 1017-1030.

⑤ 关于“铁锈带”的讨论,参见郭馨怡,谢韬:《美国总统选举中的摇摆州:2000—2020年》,载《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1期,第1—33页;宋国友,张淦:《美国“铁锈州”与特朗普的连任败局》,载《美国问题研究》,2021年第1期,第151—172页。

战”,集中体现了其贸易保护主义的本质。

第三,在身份维度上,美国选民的危机感集中于白人群体,他们的身份主体性和社会地位受到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群体的威胁。^① 这类选民绝大多数具有白人、男性、蓝领、教育程度低、老年、在乡村生活并且宗教信仰虔诚等特征。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他们意识到自己可能成为“明日黄花”,较高的社会地位与身份优越感已然不在。有学者敏锐地观察到,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美国人口结构的剧烈变化,身份政治已经成为近年来美国政治中一个显著的社会议题。^② 特朗普具有排外主义(xenophobia)和白人至上(white supremacy)的倾向,提议在美墨边境建墙、颁布“禁穆令”(Muslim ban)等行为,无一不在维护白人身份的主体性。可以说,特朗普的排外主义恰好迎合了美国的民粹选民对于缓解身份危机感的渴求。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美国的右翼民粹选民来说,三个维度的民粹诱因影响力大小可能存在不同。笔者认为,政治不信任和经济不安全固然重要,但在解释民众对民粹总统特朗普的支持上,身份危机感是最重要的民粹引诱。身份危机感在2016年以来的美国大选中扮演更重要角色,有如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身份与文化议题在美国右翼选民心中重要程度更高,甚至超过经济议题。例如,根据盖洛普的民调结果显示,近年来,与选民身份危机密切相关的移民议题已经跃居成为选民心中最重要的问题,并且主要集中于共和党选民。^③ 另一方面的解释来源于心理学文献,白人群体的身份威胁感导致这部分民众拥抱民粹主义思潮,保守主义选民支持白人至上的右翼民粹,以实现对过去主导身份认同的怀念。^④ 选民的身份威胁感诱发其自身的

① Michael Zárate, Berenice Garcia, Azenett Garza and Robert T. Hitlan, “Cultural Threat and Perceived Realistic Group Conflict as Dual Predictors of Prejudi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40, No. 1, 2004, pp. 99-105.

② 刁大明:《身份政治、党争“部落化”与2020年美国大选》,载《外交评论》,2020年第37期,第48—73页。

③ Jeffery Jones, “Immigration Surges to Top of Most Important Problem List,” *Gallup*. <https://news.gallup.com/poll/611135/immigration-surges-top-important-problem-list.aspx>, 访问时间:2024年7月17日。

④ John T. Jost, Jack Glaser, Arie W. Kruglanski and Frank J. Sulloway, “Political Conservatism as Motivated Social Cognition,” *Psychol Bull*, Vol. 129, No. 3, 2003, pp. 339-375.

防御机制,格外强调相同身份群体的团结,显著增强对不同身份群体的敌意,从而支持具有威权属性的民粹政客。^① 相比而言,反对建制派与反对全球化都不足以激发选民群体的内心防御机制。对于以白人为主导的右翼保守派选民,正是这种心理上的对白人至上身份的防御机制,解释了身份危机感甚至会压过政治与经济危机感,成为其支持乃至狂热支持特朗普的主要因素。^②

需要说明的是,特朗普崛起和回归是身份维度的民粹主义在发挥主导作用,这一理论现象并非针对所有选民,其解释力集中在右翼的保守派共和党选民。因此,理论上的推论就是选民的意识形态越保守或党派认同越倾向共和党,其对特朗普的支持就越与身份危机感密切相关。正因为身份维度的民粹诱因主要针对右翼选民,所以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选举活动中强调移民议题,唤醒选民的身份危机感,从而广泛动员右翼选民出来投票。这也解释了为何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能依然稳定保有右翼选民的坚定支持,在共和党初选中势如破竹。

美国民粹主义条件的成熟促成了特朗普的崛起,这在政治、经济和身份三个维度上均有体现,且由身份维度的因素主导。前文在理论上的论述是从国家整体视角进行,而实证的检验需要落到以选民为研究对象。换句话说,基于对美国民粹主义诱发因素的理论分析,笔者可以提出四个可检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假设均需以选民个体为分析单位进行考量。因此为了检验以上理论,笔者下潜到美国选民的视角,提出四个理论假设。

假设 1: 美国选民在政治上的危机感越强,越有可能支持特朗普。

假设 2: 美国选民在经济上的危机感越强,越有可能支持特朗普。

假设 3: 美国选民在身份上的危机感越强,越有可能支持特朗普。

① Stanley Fredman and Karen Stenner, "Perceived Threat and Authoritarianism,"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8, No. 4, 2003, pp. 741-770.

② John R. Hibbing, "How People's Sensitivity to Threats Illuminates the Rise of Donald Trump,"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3,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6/12/23/how-peoples-sensitivity-to-threats-illuminates-the-rise-of-donald-trump/>, 访问时间:2024年7月17日。

假设 4: 美国选民在身份上的危机感比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危机感更能解释对特朗普的支持。

对于以上的假设,笔者有几点说明。第一,选民在政治、经济与身份上的危机感并非完全独立,它们互相之间存在内生性。换句话说,政治危机感高的民众,大概率经济危机感也较高,同时会持有较高的身份危机感。例如,外来移民抢走本地民众的工作,属于经济危机感;外来移民同时也会威胁到白人民众的主体地位,则属于身份危机感。^① 第二,单从理论上无法推断政治、经济和身份中哪个维度的危机感更能解释特朗普的崛起。究竟是哪一维度的民粹因素更能解释特朗普的当选? 不同维度的危机感对于不同意识形态和党派认同的选民,对支持特朗普的解释程度是否具有差异? 经过其四年执政,哪种维度的民粹主义愈演愈烈? 此类问题的答案更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我们需要借助一些数据和量化方法来更准确地分析特朗普与美国的民粹主义危机的关系。

四、研究设计

(一) 数据

本文使用美国全国选举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下文简称 ANES)的民调数据。ANES 是一个长期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其目标是研究美国选民的政治行为和政策态度。自 1948 年以来,该研究几乎每两年进行一次全国抽样调查,尤其是在总统大选年,ANES 会进行大规模且有全国代表性的民意调查。ANES 数据不仅质量高、抽样科学,而且紧跟选举的热点议题,对广大学者研究美国选举和公众舆论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文的数据分析依托 2012 年、2016 年和 2020 年的 ANES 数据。2016 年的数据为主要分析对象,因为它能代表特朗普当选年份美国选民的政治

^① 关于移民属于经济民粹还是文化民粹的讨论,参见 Yotam Margalit, “Economic Insecurity and the Causes of Populism,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33, No. 4, 2019, pp. 152-170.

态度与投票行为。同时,2012年的数据为笔者提供了美国选民民粹程度的先前比较,2020年的数据则用以检验历经特朗普四年任期后美国民粹选民的发展态势。数据的分析单位为选民个人,即每个数据点代表一位美国选民。ANES对选民的社会经济背景都进行了问询,研究者可以对选民的性别、年龄、种族、教育程度等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变量进行控制。

笔者使用ANES数据有如下几点原因。首先,ANES的抽样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ANES采用了稳健的抽样方法,先将美国分层成县级集群,然后进行多阶段抽样,最终达到随机访问美国各家庭中选民的效果。为了减少系统性的不回应者偏差(non-response bias),ANES还为每位回应者赋予了权重,这些权重考虑到了未回应者的人口统计特征,笔者在后面分析中也会利用这个权重增强检验的稳健性。稳健的抽样方法和对不回应者偏差的纠正保证了ANES数据较好的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其次,ANES采取面对面和互联网访谈相结合的调查方式,拥有极高的数据质量。值得一提的是,ANES对抽样的选民进行了总统选举前和选举后两次调查,因此不仅搜集了选民选举前的一系列政治态度,还搜集了选民实际的投票选择。最后,ANES的问卷所设置的问题具有很好的连续性,即不同年份的问卷包含相同的问题,从而为不同年份的纵向比较提供了可能性。^① 相同问卷的价值在于,笔者可以用几乎完全相同的问题来分别衡量2016年以及2020年选民的民粹程度,从而保证了特朗普总统四年任期之前和之后对比的可信度。

(二) 对民粹主义诱因的测量

对民粹主义进行实证研究的一大难点在于对民粹主义诱因的测量。民粹主义的概念内核是人民对精英主义的反叛,它的诱发因素是民众在政治、经济和身份维度上的危机感或焦虑感。危机感越强,就越容易拥抱民粹主

^①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可以把不同年份的ANES数据看作时间序列数据,而非面板数据;也就是说,即便问卷的问题具有连续性,但是每年随机抽样的选民并不相同。

义,越容易支持民粹政客。对于一位选民,他对民粹主义的青睐程度是一种潜在的变量,难以直接观测。再加上民粹主义往往带有贬义,问卷调查往往不可能准确测出一个受访者在多大程度上有民粹主义的倾向。^① 相比之下,受访者多大程度上在经济、政治以及身份层面上存在危机感,则可以通过一系列问卷问题来获取相对准确的测量值。因此,笔者通过选民在一系列政策议题上的态度来测量选民在政治、经济和身份三个维度的危机感,从而估计出选民心中潜在的民粹程度。

具体而言,笔者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测量选民在经济、政治与身份三个维度的危机感或焦虑感,即三个维度的民粹指数。因子分析假定观测变量之间的方差和协方差可以由较少的潜在因子解释。这些潜在因子是不可观察的,但它们可以影响观测变量的共同特征或维度。在本研究中,观测变量为一系列政策议题的态度,由 ANES 问卷测量得出;潜在因子为选民在经济、政治与身份三个维度上的危机感,其潜在地影响着受访者对一系列政策议题的回答。

在每一个维度上,笔者选取了多个问题以测量选民心中不可观测的潜在民粹程度。问题的选择首先从民粹的概念出发,选取与政治、经济和身份三个维度的民粹主义诱因相关的具体问题,通过因子分析中的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和克隆巴克系数(Cronbach's Alpha)等拟合指标进行判定,确保所采用的问卷问题较好地对潜在因子进行测量。问卷问题的选择虽然难以做到绝对的完美,但笔者基本穷尽了 ANES 中所能用的所有问题,然后根据多个统计指标(比较拟合指数和克隆巴克系数)确定问卷问题的选择和权重。

以政治维度为例,表 1A 列举了笔者所采用的 8 个问题来衡量受访者潜在的政治危机感。这些问题包括“大部分政客是否在意人民”“政客是美国的主要问题所在”“美国政客中腐败有多普遍”“大部分政客只关心有钱有势

^① 民调中经常出现“社会期许偏差”(social desirability bias),这是指受访者可能会给出他们认为是“合适”或“被期许”的答案,而不是他们真正的观点或行为,以避免被看作是与众不同或不受欢迎的。

之人的利益”“大部分政客是不值得信任的”“像我这样的人对于政府所作所为毫无影响”“政府里有多少人腐败”和“对华盛顿政府的信任程度”。这8个问题绝大部分采取五分制(5-point Likert scale),在“强烈不同意”“不同意”“中立或无所谓”“同意”以及“强烈同意”的五级程度中选择一个答案。经过笔者重新编码,“-1”代表丝毫没有危机感,“0”代表危机感适中,“1”代表强烈危机感,因此数值越大,代表政治危机感或焦虑值越大,也就会越有潜在的民粹倾向。这些可观测变量的选取,由笔者根据民粹语境下政治危机感的概念从 ANES 问卷中筛选。统计上,为了验证这些变量衡量的是同一潜在因子,笔者计算了他们的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 Alpha)和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用来测量政治危机感的8个问题的克隆巴赫系数0.789,比较拟合指数为0.919,均符合接受范围,表现出较好的内在信度。^①由因子分析计算出的载荷(loading),代表观测变量与潜在因子之间的关系程度,表中呈现的载荷值显示了观测变量对潜在政治危机感的贡献程度。比如,“大部分政客是否在意人民”比“大部分政客是不值得信任的”更能代表选民心中潜在的政治危机感或政治民粹程度。然后,以载荷为权重,对选民对这8个问题的回答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出每一个受访者的政治危机感原始值,再把该原始值缩放到零一之间,笔者称之为“政治民粹指数”。政治民粹指数为“0”代表在政治维度上,受访者对建制派没有担忧,或强烈拥护建制精英;政治民粹指数为“1”则代表对建制精英极其反感,非常容易受到民粹主义政客的吸引、煽动甚至蛊惑。

相似地,笔者对经济民粹指数和身份民粹指数进行了同样的计算(表1B和表1C)。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维度上虽然只有5个问题,其结构效度稍弱于政治维度和身份维度的测量。^②但从概念的操作层面讲,受访者对“国际贸易好处”“自由贸易协定”“移民抢走工作”“移民对经济好处”以及“对金融

① 内在信度(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指民调中的一组问题是否测量的是同一个概念,也就是这些问题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最常用的内在信度指标为克隆巴赫系数。一般来说,信度系数达到0.7左右就可接受。

② 效度(validity)和信度(reliability)在概念上也有所不同,此处的结构效度(construct validity)指的是我们使用的测量工具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与被测量的理论概念相一致。在国际关系领域,对于民调的几类效度的讨论,参见张传杰,《中国对外政策舆论研究现状的思考》,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5期,第49—58页。

表 1 政治、经济、身份维度的危机感

问题	编码规则	载荷 loading
A 政治维度		
大部分政客是否在意人民?	五分制: -1 强烈否定; 1 强烈同意	0.411
政客是美国的主要问题所在?	五分制: -1 强烈否定; 1 强烈同意	0.363
美国政客中腐败有多普遍?	四分制: -1 几乎没有; 1 非常普遍	0.345
大部分政客只关心有钱有势之人的利益?	五分制: -1 强烈否定; 1 强烈同意	0.343
大部分政客是不值得信任的?	五分制: -1 强烈否定; 1 强烈同意	0.291
像我这样的人对于政府所作所为毫无影响?	五分制: -1 强烈否定; 1 强烈同意	0.278
政府里有多少人腐败?	五分制: -1 无人腐败; 1 全都腐败	0.240
对华盛顿政府的信任程度?	五分制: -1 经常怀疑; 1 完全信任	0.181
注: 以上问题的 Cronbach's Alpha 为 0.789, Comparative Fit Index 为 0.919。		
B 经济维度的危机感		
与他国贸易增加是否对美国有好处?	三分制: -1 很有好处; 1 没有好处	0.585
与他国自由贸易协定的看法?	七分制: -1 强烈支持; 1 强烈反对	0.472
多大可能性移民会抢走工作?	四分制: -1 绝不可能; 1 强烈可能	0.364
移民对美国经济有好处?	五分制: -1 强烈同意; 1 强烈反对	0.313
对金融市场的担忧程度?	五分制: -1 绝不担忧; 1 强烈担忧	0.134
注: 以上问题的 Cronbach's Alpha 为 0.671, Comparative Fit Index 为 0.823。		
C 身份维度的危机感		
对于在美墨边境建墙的看法?	七分制: -1 强烈反对; 1 强烈支持	0.629
如何看待叙利亚难民?	七分制: -1 强烈支持; 1 强烈反对	0.627
外国移民人数应该增加还是减少?	五分制: -1 大量增加; 1 大量减少	0.442
对于非法移民的感情温度?	百分制: -1 强烈冷漠; 1 强烈喜欢	0.385
如何看待美国政府对非法移民的政策?	四分制: -1 收留且无惩罚入籍; 1 重罪且遣返回国	0.367
遵照美国的风俗习惯有多重要?	四分制: -1 无关紧要; 1 非常重要	0.341
对于穆斯林的感情温度?	百分制: -1 强烈冷漠; 1 强烈喜欢	0.333
对于帮助黑人的看法?	七分制: -1 政府帮助; 1 黑人自助	0.329
注: 以上问题的 Cronbach's Alpha 为 0.872, Comparative Fit Index 为 0.986。		

市场的担忧”的态度能够很好地反映出经济全球化给受访者带来的危机感。在身份维度,笔者选取“对于在美墨边境建墙的看法”“如何看待叙利亚难民”“外国移民人数应该增加或减少”“对于非法移民的感情温度”“对非法移民的政策”“美国风俗习惯的重要性”“对于穆斯林的感情温度”以及“对于黑人的感情温度”共8个问题,来测量受访者的身份危机感。用于衡量受访者潜在的身份危机感的这8个问题信度最高,克隆巴赫系数达到0.872,比较拟合指数达到0.986。在对身份的危机感进行测量时,“对非法移民的感情温度”和“对穆斯林的感情温度”的原始取值是百分制,“0”代表感情温度为零,“100”代表感情温度最热烈,“50”代表不冷不热,笔者同样缩放到“-1”到“1”的区间,但同时保留了百分制精细的颗粒度。

(三) 回归模型

美国选民的政治、经济与身份危机感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特朗普的崛起?到底是特朗普导致美国民粹主义泛滥还是美国的民粹主义土壤酝酿出特朗普的崛起?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笔者将首先对政治、经济与身份危机感与选民的投票选择进行描述性分析,然后使用多元回归分析对美国民粹选民的投票行为进行更为准确的估计和剖析。多元回归分析有如下几点优势。第一,多元回归能够控制尽可能多的协变量或干扰项。因为选民的民粹程度与很多社会经济变量相关,在回归模型中加入这些先验的社会经济要素有助于获得更为准确的估计。第二,多元回归允许政治、经济和身份的民粹指数相互作用。对于一个选民,他在政治、经济、身份维度的危机感和焦虑感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多元回归允许这三个维度的危机感之间协同影响。第三,多元回归不仅可以揭示哪个维度的危机感与特朗普的崛起具有相关性,其估计值还可以量化影响程度的大小,从而帮助我们看清哪个维度与特朗普崛起的相关性更强。

笔者使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Ordinary Least Squared, OLS)来估计政治、经济、身份民粹指数与对特朗普支持程度的相关性。关于结果变量的选择,在主要分析中,笔者使用选民对特朗普的感情温度(feeling thermometer)。它是一个从0到100的连续变量,“0”表示极致寒冷的感情温度,代表非常讨厌和反对,“100”表示极致温暖的感情温度,代表非常喜欢和支持,“50”表示

不冷不热,代表既不喜欢也不讨厌。一个选民对特朗普的感情温度与其是否投票给特朗普是高度相关的(相关系数 $r = 0.84$),而且相比于零一变量的投票选择,感情温度能够提供更为精细的变量取值变化,从而提供更为准确的估计。并且,对于系数的解读,0 到 100 的感度温度也更为直观。因此,笔者在主要分析中选择使用对特朗普的感情温度作为结果变量。笔者在稳健性检验中,也把对特朗普的投票作为结果变量,并得到一致的结论。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通过因子分析所测量出的政治民粹指数、经济民粹指数和身份民粹指数。在主要分析中,模型(1)~(3)分别单独把这三个变量代入回归模型,用以观测三个维度的危机感与对特朗普感情温度的相关性。模型(4)把三个维度的民粹指数同时代入回归,是为“赛马回归”^①,从而估计出到底是哪个维度或哪几个维度更能解释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

同时,回归模型还控制了可能影响对特朗普感情温度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协变量。这些控制变量包括党派、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种族(是否为白人)。这些控制变量都是先验的,即在投票之前或做出感情温度判断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选举研究中,党派是影响选民投票的最重要因素。^② 在美国政治中,党派的概念是选民对某一个党派的身份认同,即党派认同(*party identification*)。一个选民认为自己是共和党,那他大概率会投票给特朗普。为了控制党派的影响,笔者在回归中代入衡量党派最细致的测量,即七分制党派认同变量。0 到 1 的 7 个均分点分别代表“坚定民主党”“民主党”“倾向民主党”“独立”“倾向共和党”“共和党”和“坚定共和党”。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的主要模型基于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可谓当今众多量化方法中最简单的。但因为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的系数是最佳线性无偏估

① “赛马回归”(horse-race regression)并非复杂花哨的统计模型,它就是一个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只不过,模型中的几个解释变量或自变量的变化范围一致,比如都是 0 到 1 的变量,因此,从系数的大小就可以比较出哪个变量更能解释因变量的变化。因其形式上与赛马比赛类似,学者们非正式地称之为“赛马回归”。

② 关于党派因素在选举中发挥的作用,参见 Donald Green, Bradley Palmquist and Eric Schickler, *Partisan Hearts & Minds: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Social Identities of Voter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Michael Lewis-Beck, William Jacoby, Helmut Norpoth, Herbert Weisberg and Philip Converse, *The American Voter Revisited*,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计(BLUE, Best Linear Unbiased Estimator),以及该方法十分直观和简洁,本文的主要结果由多元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呈现。当然,笔者也做了大量的稳定性检验,使用不同模型、不同变量以及加权样本(weighted sample)分别进行了分析,其结果与主要分析一致,从而保证了主要结果的稳健性。

五、统计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美国民粹选民画像

为了整体把握美国选民的民粹程度,描述美国民粹选民的画像,笔者首先对美国选民的民粹指数进行描述性分析。在计算出每位受访者的政治、经济和身份民粹指数之后,取平均值即获得该民众的“综合民粹指数”。根据2016年ANES的样本,图1展示了2016年美国选民的综合民粹指数的分布情况。横轴上,“0”代表民粹指数极低,即在政治、经济和身份上均毫无危机感;“1”代表民粹指数极高,在政治、经济与身份上均有强烈的焦虑感;纵轴显示的是受访者数量。经过计算和测量,共获得1276个有效的受访样本,对美国全国人口的估计能获得小于3%的标准误差。笔者发现,2016年的美国选民的综合民粹指数分布类似一个正态分布,即民粹和不民粹的选民数量相近,且绝大多数选民的民粹指数是居中的。从这样的分布可以看出,并非所有的美国选民都有民粹倾向,一半民众具有较强的民粹倾向,而另一半则不容易被民粹所蛊惑。这一分布其实并不令人意外,这与近年来美国政治领域对选民极化(voter polarization)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例如,安东尼·福乐及其合作者在2023年发现绝大多数美国选民的意识形态、议题态度还是温和的、居中的。^①

为了更清晰地展现美国民粹选民拥有怎样的特征,描绘出美国民粹选民的画像,笔者根据以上的测量,对综合民粹指数最低的10%民众与最高的10%民众进行对比,采用t检验比较这两组选民在社会经济要素上面的差异

① Anthony Fowler, Seth J. Hill, Jeffrey B. Lewis, Chris Tausanovitch, Lynn Vavreck and Christopher Warshaw, “Moder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17, No. 2, 2023, pp. 643-660. 同样的观点,请参见 Stephen Ansolabehere, Jonathan Rodden and James M. Snyder Jr, “Purple America,”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0, No. 2, 2006, pp. 97-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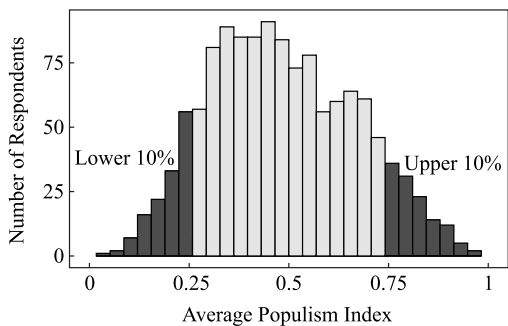


图 1 2016 年美国选民的综合民粹指数分布

注：笔者自制。样本量=1276。

（见表 2）。笔者发现，美国最民粹的 10% 选民与最不民粹的 10% 选民在性别比例上没有差别；但是有民粹倾向的这些民众年龄更大、白人比例更高、受教育程度更低且更贫穷，这些差异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具体来看，极端民粹的选民比极端不民粹的选民的平均年龄大 4 岁，并且白人的占比多出 11%；受教育程度上，极端民粹的选民比极端不民粹的选民平均相差一个本科学位，并且收入水平相差每年三万美金。

表 2 2016 年美国民粹选民的社会经济差异

	综合民粹指数 最低 10% 民众	综合民粹指数 最高 10% 民众	差异	p 值
女性	49%	49%	0	0.912
年龄	50 岁	54 岁	+4 岁	0.080
白人	76%	87%	+11%	0.015
教育程度	大学本科	高中毕业或大专	一本科学位	0.000
收入水平	\$ 75000~\$ 80000	\$ 45000~\$ 50000	-\$ 30000	0.000

注：笔者自制。本表格由 t 检验得出。

本文的核心贡献在于厘清哪种民粹诱因更能解释美国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笔者发现，美国民众在政治、经济与身份三个维度的危机感对其投票行为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图 2 分别展示了 2016 年政治民粹、经济民粹与身份民粹指数的分布，并且把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和希拉里的选民用深浅颜色进行区分。可以看出，首先，政治维度上，特朗普选民与希拉里选民的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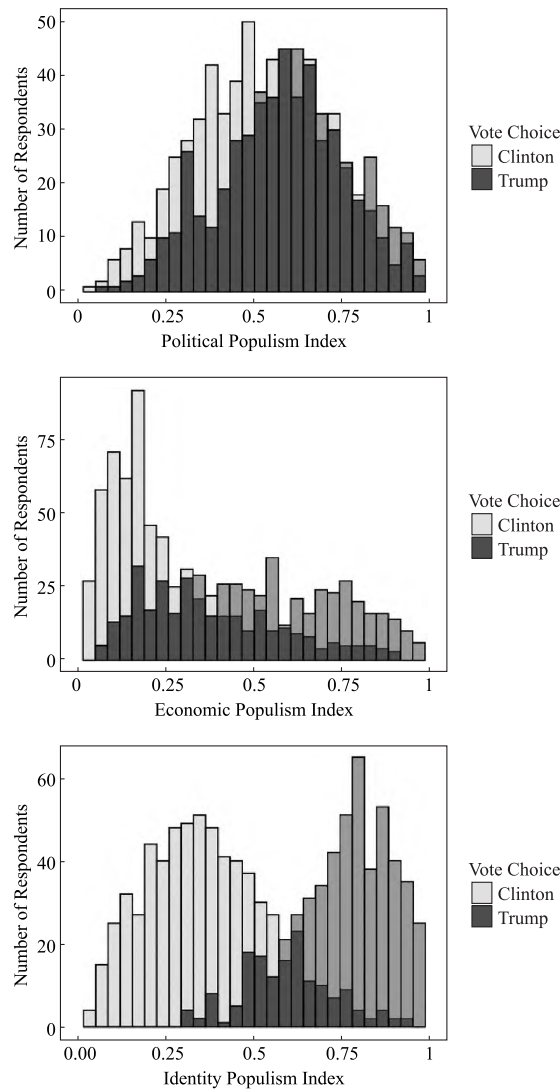


图 2 2016 年政治民粹、经济民粹与身份民粹指数的分布与投票行为

注:笔者自制。深灰色的条状图代表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浅灰色的条状图代表投票给希拉里的选民。

相似,均类似一个正态分布,希拉里选民的政治民粹指数的均值(0.518)略低于特朗普选民的均值(0.589)。可以说,选民在政治上的危机感,如他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并不能有效区分特朗普选民和希拉里选民。其次,经济维度上,希拉里选民对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危机感知呈现一个右侧重尾的分

布,即大部分希拉里选民在经济维度的危机感较低。特朗普选民对自由贸易的焦虑值类似一个均匀分布,即这些选民对自由贸易的焦虑程度上有高低,且分布相对均匀。最后,也是最能区分特朗普选民与希拉里选民的维度,是身份上的危机感和焦虑程度。身份民粹指数呈现一个双峰的分布,特朗普选民的平均身份危机感(0.754)远远高于希拉里选民(0.367)。身份上越敌视移民、越有身份危机、越重视美国文化传统的选民,越支持特朗普。

美国民众在政治、经济、身份三个维度的危机感与其投票选择的可视化,清晰地展现出身份维度的危机感最能区分特朗普选民与希拉里选民。然而,此分析无法控制其他的协变量或干扰项,也无法允许政治、经济与身份的民粹指数相互作用。因此,我们还需借助回归模型来得出更为准确的估计。

(二) 回归结果

表3展示了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选民的民粹程度与对特朗普感情温度的相关性。模型(1)~(3)表示,控制了党派和其他社会经济变量后,政治危机感、经济危机感和身份危机感都与选民对特朗普的感情温度正相关且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p 值小于0.01),在统计上验证了前面提到的三个假设。

表3 2016年美国选民的民粹程度与对特朗普感情温度

	结果变量			
	对特朗普的感情温度(0~100)			
	(1)	(2)	(3)	(4)
政治民粹指数(0弱~1强)	18.384*** (3.211)			0.047 (2.939)
经济民粹指数(0弱~1强)		36.313*** (2.536)		11.695*** (2.758)
身份民粹指数(0弱~1强)			66.806*** (2.927)	59.200*** (3.447)
党派(七分制:0强民主党; 1强共和党)	63.951*** (1.662)	56.619*** (1.675)	37.839*** (1.873)	38.284*** (1.874)
女性	-1.379 (1.208)	-2.323** (1.152)	-1.401 (1.061)	-1.764* (1.059)

续表

	结果变量			
	对特朗普的感情温度(0~100)			
	(1)	(2)	(3)	(4)
年龄	0.183*** (0.035)	0.164*** (0.033)	0.060* (0.031)	0.072** (0.031)
教育程度	-2.036*** (0.273)	-1.237*** (0.266)	-0.841*** (0.244)	-0.652*** (0.248)
白人	5.374*** (1.443)	5.103*** (1.373)	3.404*** (1.270)	3.562*** (1.265)
常数项	7.611* (4.476)	0.278 (3.843)	-12.467*** (3.594)	-15.560*** (4.056)
样本量	1630	1630	1630	1630
R ²	0.543	0.586	0.647	0.651

注:笔者自制。* $p<0.1$; ** $p<0.05$; *** $p<0.01$ 。

当把三个变量放入同一模型时,选民在身份维度的危机感最能解释特朗普的崛起。如模型(4)所示,政治民粹指数在解释特朗普的感情温度中失去了显著性;经济民粹指数虽然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系数大幅减小;而身份维度不仅保持统计的显著性,且仍然保持较大的系数。首先,聚焦政治维度对系数进行解读:当经济 and 身份民粹指数以及其他社会经济等变量得以控制时,政治维度的危机感并非解释对特朗普感情温度的显著要素。需要注意的是,选民对政府的不信任与对特朗普的支持相关性较弱,不代表对民粹政治的否定,而是表明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民粹主义,并非由反建制的政治维度诱因所主导。其次,聚焦经济维度对系数进行解读: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位完全拥抱经济全球化、在经济上没有危机感的选民与一位反全球化并拥有极为强烈的经济危机感的选民相比,他们对特朗普的感情温度相差约 12 度。虽然经济民粹指数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但其影响程度弱于身份维度的民粹指数。最后,聚焦身份维度对系数进行解读:当其他两种民粹指数以及社会经济等变量得以控制时,与一个完全没有身份危机感的选民相比,一个拥有极强身份焦虑值的选民对特朗普的感情温度要高达约 60

度。而且,身份危机感对特朗普感情温度的影响程度,不亚于甚至超出选民党派认同的影响。^①学界普遍认为,美国总统大选中,选民是什么党派就会给哪个党的候选人投票,呈现一种盲目的“部落化”的趋势。^②而笔者在此发现,即便是控制了党派的影响,身份的危机感仍然对于民众对特朗普的感情温度有着很好的解释力。因此,我们在统计上验证了假设4,可以说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更多的是一种身份上的民粹,是一种由身份政治、白人至上、反对移民的身份保守主义所主导的民粹;少部分是一种反全球化的经济民粹。

除此之外,笔者还做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详见附录中的表A1。笔者运用ANES提供的受访者权重,进行了加权最小二乘回归(Weighted Least Squared, WLS)分析,从而能够更好地代表美国全国选民,其结果与主要结果几乎一致。另外,“是否给特朗普投票”的零一变量也可以当作结果变量。笔者用线性概率回归(Linear Probability Model)和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同时进行了分析,结果依然与上面的主要分析一致。

深入探讨选民的身份危机感与对特朗普支持的相关性,笔者针对选民的党派认同和意识形态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根据选民在ANES问卷中对党派认同的自我认知,选民可被分为民主党(占36%)、无党派(占30%)和共和党(占33%);选民对意识形态的自我认知,可被分为自由派(占35%)、温和派(占23%)和保守派(占42%)。基于表3模型(4),笔者将选民的党派认同和意识形态分别与政治、经济、身份民粹指数做交叉项,然后把不同党派认同和意识形态的选民在三个维度上民粹指数与特朗普感情温度的相关性分别求出,并在图3上进行了可视化。

图3的结果清晰地表明,因为身份危机感而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主要集中在右翼的共和党保守派选民。具体而言,控制其他因素不变,对于共和党

① 根据模型(4),其他条件相同,相比一位坚定的民主党选民,一位坚定的共和党选民对特朗普的感情温度只高出38度。

② 刁大明:《身份政治、党争“部落化”与2020年美国大选》,载《外交评论》,2020年第37卷,第6期,第48—73页;Christopher Achen and Larry Bartels, *Democracy for Realists: Why Elections Do Not Produce Responsive Govern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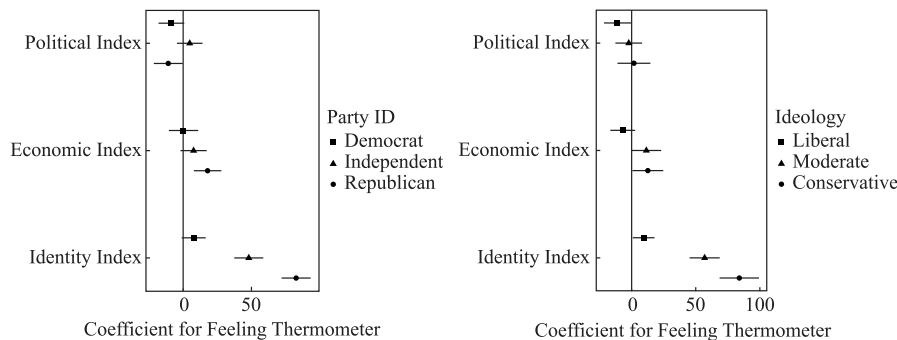


图 3 三种民粹主义指数在党派认同和意识形态上的异质性

注：笔者自制。左右两图分别基于表 3 模型(4)，把选民的党派认同和意识形态分别与政治、经济、身份民粹指数做交叉项，图中每个点表明不同种类的选民在三个维度上的民粹指数与对特朗普感情温度的相关性，横线代表 95%置信区间。左图中，方形代表民主党，三角形代表无党派，圆形代表共和党；右图中，方形代表意识形态的自由派，三角形代表温和派，圆形代表保守派。

和保守派的选民来说，一个拥有极强身份危机感的选民比一个完全没有身份危机感的选民，对特朗普的感情温度要高大约 70 到 80 度，并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而对于无党派和温和派选民来说，身份焦虑与对特朗普的感情温度的相关程度则相对低，回归系数在 50 左右。对于民主党和自由派选民而言，身份焦虑则与其是否支持特朗普无关。由此可见，从身份和文化维度解释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主要是由右翼的共和党保守派选民的主导。随着选民的党派认同更倾向共和党、意识形态更倾向保守派，身份危机感越能解释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

(三) 美国民粹主义的历史变化

经历特朗普四年的总统任期，美国的民粹主义危机是否愈演愈烈？民粹倾向对美国选民的投票选择影响是否逐渐加剧？要回答这个问题，笔者把实证分析做了时间上的拓展，对 2012 年的 ANES 数据和 2020 年的 ANES 数据也进行了分析。ANES 问卷具有非常高质量的问卷连续性，所以笔者用同样的问卷问题来测量 2012 年和 2020 年美国选民在政治、经济和身份维度的民粹程度。对于三个维度的民粹指标的测量，2020 年与 2016 年所使用的问卷问题完全一样，因此 2020 年与 2016 年的对比具有很强的可信

度。受限于问卷问题的连续性,对 2012 年三个维度民粹指标的测量的误差会稍大于其他两个年份,但每个维度仍有 2 到 5 个测量问题,同样具有良好的内在信度。^①然后,笔者使用同样的“赛马回归”,即表 3 的模型(4),来估计政治、经济和身份危机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选民对共和党总统提名的感情温度。

从更直观的角度来理解这一分析的逻辑:2012 年相当于一个安慰剂测试(placebo)。我们假定特朗普是典型的民粹政客,而 2012 年共和党总统提名罗姆尼却与民粹相距甚远,他反而是一个典型的建制派政客。因此,笔者用同样的方法测量了政治、经济和身份危机感,然后用回归分析估计出这三个维度的民粹指标与对罗姆尼感情温度的相关性,如果没有民粹危机,那我们应该看不到显著的相关系数,如果存在显著的相关系数,也应该是负的系数。但是,如果发现哪一个维度的危机感与罗姆尼感情温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那就表示这种维度的民粹条件在特朗普出现之前就有所萌芽。同样的分析放在 2020 年,能一定程度反映出特朗普的四年总统任期对于美国民粹主义的影响。

同时,笔者也把 2012、2016 和 2020 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感情温度作为结果变量。如前文所述,美国的这一波民粹主义属于右翼民粹,因此政治、经济、身份危机感与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感情温度的相关性应该为负数。如果存在负相关,可以更有力地说明右翼民粹主义至少在 2012 年已经开始塑造美国选民对总统候选人的偏好。

如图 4 所示,从 2012 年到 2020 年,三个维度的民粹主义程度对投票行为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变化趋势。政治维度上,无论是 2016 年还是 2020 年,选民的危机感或对其政府的不信任都与对特朗普的感情温度没有显著联系;而在 2012 年,政治危机感却与对罗姆尼的感情温度存在了显著关联。有趣的是,2012 年政治民粹指标与罗姆尼感情温度的相关系数为负,也就是说,政治上越民粹的选民,反而越不支持罗姆尼。这一发现也符合我们对美国政治的理解,因为罗姆尼本身就是资深的政客,再加上其摩门教的背景,

^① 附录中表 A2 列出了笔者对各民粹指标测量所使用的问卷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在 2012、2016 和 2020 年的使用情况。

他得不到民粹选民的拥戴也并不意外。而对于民主党的候选人来说,2012年的奥巴马、2016年的希拉里和2020年的拜登都是建制派政客,实证结果与期待相符,即选民越不信任政府,越不会支持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尤其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政治危机感几乎无法区分选民对罗姆尼或奥巴马的感情温度。这一实证发现更有力地说明了反建制的民粹主义在2012年已然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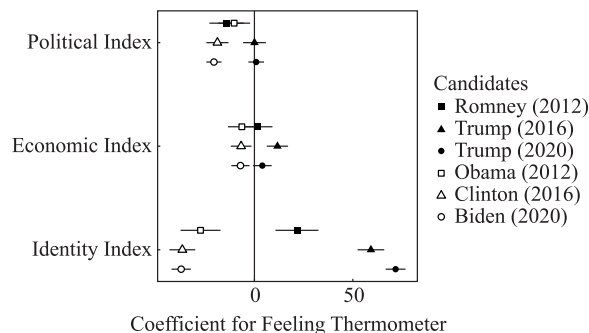


图4 三种民粹主义指数与共和党候选人感情温度相关性的历史变化(2012—2020)

注:笔者自制。每个点表明选民在某方面民粹指数与其对总统候选人感情温度的相关系数,横线代表95%置信区间。回归模型与表3模型(4)相同,即结果变量为选民对总统候选人的感情温度,解释变量为政治民粹指数、经济民粹指数和身份民粹指数,控制变量包括党派、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种族。方形代表2012年选举,三角形代表2016年选举,圆形代表2020年选举;黑色实心点代表共和党候选人,白色空心点代表民主党候选人。如图例所示,本图展示了6个回归模型,结果变量为6位不同的总统候选人,比如,方形黑色实心表示选民的政治、经济、身份维度的危机感与其在2012年对罗姆尼感情温度的相关性。

经济维度上,虽然我们在2016年数据中观察到,特朗普的上台与选民反全球化的经济危机感正相关,但是我们在2012年和2020年都没有看到同样的效应。同时,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支持度方面,经济危机感的解释力也非常小,并且在三届总统选举中稳定地保持较小的相关性。从共和党 and 民主党两方面综合考虑,结合三届总统选举数据,均说明了美国的民粹主义并非由反全球化的经济危机感所主导。

身份维度上,美国选民的身份危机感的系数变化趋势则十分耐人寻味。笔者发现,早在2012年,选民的身份危机感就与投票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身份民粹指数从零到一的变化对应了对罗

姆尼感情温度 30 度左右的升高,并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这一实证结果表明,在特朗普出现之前,很多美国选民,尤其是共和党选民,他们在身份上的焦虑感已经存在,并影响他们的投票选择。因此,可以说特朗普的出现,恰恰是把握和利用了选民在身份上的危机感。不仅如此,在 2020 年,身份危机感对选民对特朗普的感情温度存在更强的解释力,回归系数甚至比 2016 年还要大。由此可见,在经历了特朗普的四年执政之后,美国右翼选民的投票行为与身份危机感的相关性呈现逐渐提升的态势。反观民主党,身份危机感在 2012 年到 2020 年均与选民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感情温度呈显著的负相关。选民的身份危机感与对民主党候选人感情温度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在 2016 年和 2020 年均小于共和党(约一半左右)。

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份危机感越来越成为区别选民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还是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重要因素。从图 4 中可见,选民的身份危机感与其对民主党或共和党候选人感情温度的相关系数之间的距离呈现逐年拉大的趋势。回归模型控制了党派、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种族等因素,这说明身份维度主导的民粹主义,已经成为能够左右当今美国选举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在 2024 年,特朗普几乎无悬念地赢得了共和党总统竞选提名。基于以上实证趋势,特朗普的回归与美国民众这种身份维度的焦虑感密切相关。以反移民为内核的身份或文化焦虑感,在美国受教育程度较低且收入不高的白人群体不断蔓延,他们盲目地买单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口号以及政策,是特朗普的铁票。并且,这一身份民粹危机已出现向其他领域蔓延的态势,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危机。^①

六、结语

唐纳德·特朗普的崛起由一系列与他个人无关的外生性因素所决定——政治的失效、经济的放缓以及美国民众身份认同的危机。特朗普不

^① 王浩:《“罗伊诉韦德案”裁决与美国保守主义的当代内涵及演化》,载《美国问题研究》,2022 年第 2 期,第 125—142 页。

是这些因素的创造者,但他利用了这些因素,并在其帮助下成功当选美国总统。这标志着美国的民主已经陷入了一场民粹主义危机。即使2016年特朗普没有当选总统,危机依然会到来,因为民粹主义产生的条件已在美国成熟。这些条件中,美国民众身份维度的危机感和焦虑感是当今美国民粹主义的最大诱因,它在大龄、受教育程度低、收入贫困的白人选民中蔓延,这些右翼选民是特朗普崛起和回归背后最核心的支持者。2024年特朗普的再次当选,很大程度上与美国民粹主义危机的延续有关。即便特朗普时代过去,这些右翼民粹选民依然会支持其他具有民粹特质的政客。

从本文的实证分析扩展开来,美国选民的民粹主义倾向还可能具有一系列连锁的影响,并且值得进一步研究。第一,民粹总统特朗普对美国民主制度已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比如,特朗普质疑2020年选举计票以及不承认败选结果,并导致了2021年1月6日的冲击国会山事件。第二,伴随着民粹选民对选举的影响加强,传统政客不断丧失选民基础,温和派不愿意参与国会议员席位的竞争,从而加深了美国政治精英的极化。^①例如,参议员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和乔·曼钦(Joe Manchin)均宣布2024年任期结束后退休。第三,民粹政客和特朗普拥趸占据华盛顿政治舞台中心。例如,2023年以佛罗里达众议员马特·盖茨(Matt Gaetz)为首的一小撮共和党极端派,在众议院议长的投票中造成混乱,不仅在新年伊始直接导致议长的“难产”,还在年末意外地投票罢免了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并选举出特朗普的拥趸麦克·约翰逊(Mike Johnson)为新任众议院议长。^②总之,民众对政治低效、经济放缓和身份认同的焦虑恐怕会愈演愈烈,而其中以身份危机感为核心的民粹主义也将持续影响美国政治,甚至导致美国民主的进一步倒退。^③

① Andrew Hall, *Who Wants to Run? How the Devaluing of Political Office Dries Polarization*,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9.

② Ruth Bloch Robin, "Organizing at the Extreme: Hardline Strategy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 *Congress & the Presidency*, Vol. 48, No. 1, 2022, pp. 1-30.

③ 关于民主倒退的理论梳理与讨论,参见 Edoardo Grillo, Zhaotian Luo, Monika Nalepa and Carlo Prato, "Theories of Democratic Backsliding,"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7, 2024, pp. 381-400.

附录

表 A1 稳健性检验

	结果变量			
	对特朗普的感情温度 (0~100)		对特朗普的投票 (0 或 1)	
	<i>OLS</i> (1)	<i>WLS</i> (2)	<i>LPM</i> (3)	<i>Logistic</i> (4)
政治民粹指数(0 弱~1 强)	0.047 (2.939)	-0.500 (2.950)	-0.014 (0.045)	-0.213 (0.624)
经济民粹指数(0 弱~1 强)	11.695*** (2.758)	11.082*** (2.721)	0.171*** (0.042)	1.901*** (0.574)
身份民粹指数(0 弱~1 强)	59.200*** (3.447)	59.793*** (3.394)	0.630*** (0.052)	6.452*** (0.728)
党派(七分制:0 强民主党; 1 强共和党)	38.284*** (1.874)	38.059*** (1.851)	0.626*** (0.029)	5.013*** (0.382)
女性	-1.764* (1.059)	-1.292 (1.074)	0.005 (0.016)	0.051 (0.222)
年龄	0.072** (0.031)	0.060* (0.031)	0.002*** (0.0005)	0.017** (0.007)
教育程度	-0.652*** (0.248)	-0.717*** (0.239)	-0.003 (0.004)	-0.040 (0.054)
白人	3.562*** (1.265)	5.073*** (1.252)	0.071*** (0.020)	0.635** (0.282)
常数项	-15.560*** (4.056)	-15.297*** (3.850)	-0.367*** (0.066)	-8.302*** (0.987)
样本量	1630	1630	1282	1282
R^2	0.651	0.642	0.671	

续表

	结果变量			
	对特朗普的感情温度 (0~100)		对特朗普的投票 (0 或 1)	
	<i>OLS</i>	<i>WLS</i>	<i>LPM</i>	<i>Logistic</i>
	(1)	(2)	(3)	(4)
Log Likelihood				-292.287
Akaike Inf. Crit.				602.575

注：* $p<0.1$ ；** $p<0.05$ ；*** $p<0.01$ 。模型(1)与模型(2)的因变量是对特朗普的感情温度，为0到100的连续变量，模型(3)与模型(4)的因变量为是否对特朗普投票，为0或1的哑变量。模型(1)与正文中表3的模型(4)相同，为线性回归(ordinary least squared)，列于此便于比较。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利用 ANES 提供的受访者权重进行了权重线性回归(weighted least squared)。模型(3)是对哑变量的线性回归，也称之为概率线性模型(linear probability model)。模型(4)是对哑变量进行的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

表 A2 不同年份对民粹指标测量的问卷问题

问题	2012	2016	2020
政治维度			
大部分政客是否在意人民？		✓	✓
政客是美国的主要问题所在？		✓	✓
美国政客中腐败有多普遍？	✓	✓	✓
大部分政客只关心有钱有势之人的利益？		✓	✓
大部分政客是不值得信任的？		✓	✓
像我这样的人对于政府所作所为毫无影响？		✓	✓
政府里有多少人腐败？		✓	✓
对华盛顿政府的信任程度？	✓	✓	✓
经济维度			
与他国贸易增加是否对美国有好处？		✓	✓
与他国自由贸易协定的看法？		✓	✓
多大可能性移民会抢走工作？	✓	✓	✓
移民对美国经济有好处？		✓	✓
对金融市场的担忧程度？	✓	✓	✓

续表

问题	2012	2016	2020
身份维度			
对于在美墨边境建墙的看法？		✓	✓
如何看待叙利亚难民？		✓	✓
外国移民人数应该增加还是减少？	✓	✓	✓
对于非法移民的感情温度？	✓	✓	✓
如何看待美国政府对非法移民的政策？	✓	✓	✓
遵照美国的风俗习惯有多重要？		✓	✓
对于穆斯林的感情温度？	✓	✓	✓
对于帮助黑人的看法？	✓	✓	✓